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七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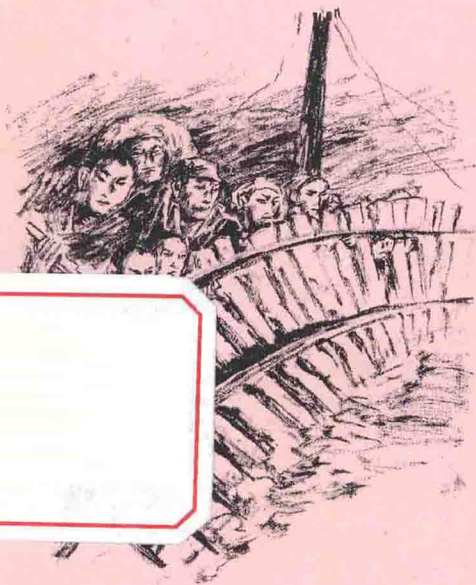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张国祥

/ 著

这段历史见证了日寇的疯狂与野蛮，同时也见证了人民战争这一“火牛阵”的巨大威力。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张国祥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7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665-6

I.山… II.张… III.①农村革命根据地-反扫
荡-史料-山西省②农村革命根据地-反蚕食-史料-
山西省 IV.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24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七辑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张国祥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字数:300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套

*

ISBN 7-203-04665-6
K·272 定价: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录

- 一、根据地全面建设的开始和严重困难的
出现 (1)
- 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8)
 - (一) 北岳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9)
 - (二) 晋绥边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 (14)
 - (三) 太行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21)
 - (四) 太岳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29)
 - (五) 反“扫荡”作战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 (34)
- 三、抗日军民的反“蚕食”斗争 (35)
 - (一) 反“蚕食”斗争的最初胜利 (36)
 - (二) 反“蚕食”斗争的深入开展 (42)
 - (三) 反“蚕食”斗争中的“围困战”
..... (48)

引 子

从1940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全面建设的历史新阶段。然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1941年和1942年的敌后抗战最困难的年代。在这两年中，日本侵略军以疯狂的“扫荡”与“蚕食”进攻，来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因此，“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就成为这一时期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在这一生死斗争中，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抗日军民打出了威震敌胆的雄风。

一、根据地全面建设的开始和严重困难的出现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县召开太行、太岳、冀南3区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杨尚昆、刘伯承分别作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中“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策略方针，总结了华北地区抗战以来的工作，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与积极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任务，讨论了关于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等问题。从此，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全面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通过建党，调整了党的领导机构，加强了党的领导。通

过建政，在已有统一的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统一政权机构。各根据地调整后的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是：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李雪峰；中共晋豫区委，书记聂真；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安子文；中共晋西区委，书记林枫；中共北岳区委，书记刘澜涛。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宋劭文，副主任委员胡仁奎；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主任续范亭，副主任牛荫冠；8月，冀太联办成立，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戎伍胜。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伍胜。

“黎城会议”后的4个月，八路军发动了一场旨在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役进攻，这就是以山西为主战场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敌人是凶恶的，也是狡滑的。当时，刘伯承曾生动地比喻说：从“囚笼政策”的意义上讲，铁路好比“柱子”，公路好比“链子”，据点好比“锁子”。日寇现在正忙于装置这样一个“囚笼”，企图把我抗日根据地之军民分割开来，永远作它屠刀下的羔羊，任其宰割。正值敌人大做“囚笼”好梦的时候，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八路军以105个团、40万人的兵力，在5000里长的战线上，于同一小时内突然发动了交通总破击战。

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结束，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分作3个阶段进行：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在华北

地区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是正太铁路；9月11日至10月5日为第二阶段，重点进行歼灭战，消灭交通线两侧之敌和摧毁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敌据点，主要发动了太行区的榆（社）辽（县）战役和北岳区的涞（源）灵（丘）战役等；10月6日至12月5日为第三阶段，主要进行反“扫荡”作战，粉碎敌人的报复进攻，重点进行了太行区的武乡县关家垴等战役。整个战役共作战1824次，歼灭敌伪25800人，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44里，拔除据点2993个……

这样，“柱子”被截断了，“链子”被破坏了，“锁子”被摧毁了，守敌被消灭了。敌人煞费苦心装置起来的“囚笼”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欣闻“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毛泽东电贺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任何一个重大革命事件，不仅会左右当时的斗争全局，而且将牵动未来的历史节奏。“百团大战”及其胜利的重要意义，不只在在于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而且在于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为渡过行将到来的重重难关奠定了坚固的群众基础。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为严重困难的年代。在这两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在武汉失守以后就改变了的战略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主要兵力，以疯狂的“扫荡”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敌后，日军发动的“扫荡”作战越来越频繁与残酷，光千人至数万人的大“扫荡”竟多达174次，使用兵力达83.3万余人，

较 1939 年和 1940 年分别增加了三分之二和五分之三。日军的这种频繁而大规模的“扫荡”，更加施用于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根据地。两年中，敌人对晋冀豫边区的大“扫荡”有 19 次，中、小“扫荡”达 500 多次。对晋绥边区的大、中、小“扫荡”达 33 次，持续时间长达 400 余天。对以北岳区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扫荡”，无论在次数上和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敌人的疯狂“扫荡”，又是和推行“蚕食”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以“扫荡”作为“蚕食”的先导，又以“蚕食”来推进“扫荡”。为了达到“扫荡”的目的，实现“蚕食”的阴谋，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包围”更加深了，“分割”更厉害了，“封锁”也更严密了。而敌人实行“包围”、“分割”与“封锁”的手段，便是所谓扩展其“点”、“线”的建设。单是敌据点设施，到 1941 年和 1942 年间，北岳区即猛增至 1400 多个，太行区和太岳区增至 1000 多个，晋西北区增至 500 多个。随着敌人“扫荡”与“蚕食”的步步升级，“包围”、“分割”、“封锁”的日益加剧，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进攻与自然灾害的连年发生，使我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武装部队也减员了。北岳区的四周均退缩了 15 到 20 公里。太行区的面积差不多缩小了五分之一。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太岳区竟无一完整县，以至有 12 个县政府都聚集在沁源一地，而沁源县城也被敌人占领了。晋西北区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第八分区只剩下 17 个行政村在我手里。而且，各根据地

军需民用，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发生了严重问题，“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扫荡”过程中，敌人大施其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例如，1941年敌人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秋季大“扫荡”，就惨杀我民众4500余人，杀害与捕捉我革命干部600多人，抓去群众17000余人，烧毁屋房15万多间，抢走粮食5800万斤、牲畜8万多头，毁坏庄稼5万余亩、农具和家具60余万件。1942年敌人对晋绥边区晋西北区的春季大“扫荡”，仅在兴县、临县、保德3地就捕杀我民众3450余人，烧毁屋房23680余间，抢走粮食35000石、牲畜8万余头、金银首饰和农具13万余件。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区，从1940年至1944年5年内，被日军屠杀的民众达85800余人，烧毁房屋81.3万余间，损失粮食22.1余万斤、被服946.9万余件、耕畜479万多头、羊100005500只、猪883000多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1941年和1942年间被敌杀、烧、抢去的。

桩桩件件，累累惨象，真是“兽兵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多村庄，都变成废墟”。

对于抗日军民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在各根据地许多领导人的文章中都作了真切的描述。正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村庄被抢掠一空，只剩一些残垣断壁。1942年，边区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所有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空

前的困难。人民群众吃的、住的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树皮、树叶。不少青壮年被敌人抓走，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生产大幅度下降。部队粮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个时期，疟疾、痢疾、回归热等多种疾病在边区许多地方蔓延流行，不少部队发生了夜盲症，各种药品和生活日用品也十分短缺。”“困难是严重的，而且日甚一日……”

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困难的1941和1942年间，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即成为敌我双方拼死争夺的激烈的搏战地带，我军能不能顶得住，不仅直接关系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战的坚持，而且直接关系着华北抗战的坚持，乃至直接牵动着抗日战争全局的命运，问题是极其尖锐而严重的。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永远不会向任何敌人和困难低头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挺直民族的脊梁，同前所未有的人祸天灾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抗争。尽管由于日军连续不断地疯狂“扫荡”，步步紧逼地“蚕食”进攻，以及敌、伪、顽的合力夹击与严密“封锁”，使我抗日根据地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度的困难。但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这期间，党的领导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德怀、邓小平；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聂荣臻；中共晋西区委，书记林枫；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关向应、林枫；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李雪峰；中共晋豫区委，书记聂真；中共太岳区委，书记

安子文、薄一波、聂真；中共北岳区委，书记刘澜涛），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英明指示与部署，严格遵循党为战胜困难而制定的著名的“十大政策”，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反革命的“总力战”，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进行武装建设，繁荣文化事业；从而逐渐地加强了内部，恢复了元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胜利地开创了真正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局面，并由此积累了劳武结合、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战胜灾荒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创造了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联防战、围困战等各种各样的对敌斗争形式，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声名大震的英雄模范人物。就这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以人民战争的铁拳，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与“蚕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和进攻，顶住了敌、伪、顽的夹击，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险关，站住了脚跟，坚持了阵地，保存了力量：我们的山区战略基地——晋察冀边区之北岳区，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太岳区，以及晋绥边区没有被摧毁；我们的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各战略区党委、军区、政府没有被消灭；我们的抗日武装——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民兵组织没有被打

散；我们的基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没有被征服。相反，从1942年下半年起，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始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里，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广大平原解放区，都曾遭到敌人的严重切割、分割和摧残，变成为“格子网”与细碎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致使我“大兵团的活动困难，甚至根本不能活动”。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党即把这些地区的大批干部和相当的主力部队，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到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中来，以进行休整、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有利的战斗。由此可见，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抗日军民在最困难时期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艰苦卓绝斗争，不但坚持了山区抗战阵地，坚持了山岳地带的抗日战争，而且支撑了平原抗战阵地，支撑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战争。这样一来，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就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成为支持华北长期“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为我夺取抗战胜利“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作出了极可宝贵的贡献。

二、抗日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的最困难年代，日本侵略军向我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发动了连续的、大规模的疯狂“扫荡”，妄图捕捉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各战略区的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妄图消灭我抗日

的主力部队，妄图毁灭我支撑抗战的敌后山区根据地。敌人是极其毒辣、凶残的。但是，在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奋战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进攻，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

（一）北岳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作战，先后进行过数十次。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最烈者，要算1941年秋季、1943年春季和秋冬季节的反“扫荡”作战了。

1940年秋冬，由八路军发动的以山西为主战场的“百团大战”，使敌华北方面军一败涂地，遭到沉重打击。但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决计要对我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一场报复性的“扫荡”战争。被日军称为“百万大战”的“扫荡”，就是1941年秋季敌人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实施的大规模“扫荡”。担任此次“扫荡”作战的总指挥，是接替因实施“囚笼政策”失败被撤职的多田骏而新上任的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所以这也就成为冈村宁茨上台以后走的第一着棋。为确保这次“扫荡”作战的成功，冈村宁茨调集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及伪军一部共7万余人的兵力。在敌人发动“扫荡”进攻以后，晋察冀军区即指挥北岳区军民，采取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方针，运用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方式和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之灵活战术，开展了反“扫荡”作战。当敌人集中兵力向我“合围”时，我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留置原

地，发动群众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与敌周旋，以消耗、疲惫其力量，而主力部队则分兵进至敌人侧后，袭击其据点、交通线，伏击或阻击各路进攻之敌，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亦遂之实行转移，使敌“合围”扑空，阴谋破产；当敌人深入我腹地实行“分区清剿”时，内线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坚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袭击敌之运输队，消灭“搜剿”之敌，打击日伪政权，掩护群众秋收，外线主力部队则相机集中转戈回击，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并且在晋绥、太行、太岳、冀南、冀中、冀东等区军民之有力配合下，致使各路敌军屡遭重挫，我胜利收复阜平城，“扫荡”北岳区之敌被迫撤退。当敌撤退之际，我晋察冀军区各主力部队又迅速集中，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乘胜展开了袭击、伏击、追击逃遁之敌的作战，再给敌军以有力打击。至10月中旬，反“扫荡”作战宣告结束。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两个多月，总共作战800余次，歼敌5500余人，挫灭了敌人消灭我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我中心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失败的冈村宁茨不得不惊呼，“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无奈只好用“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为自己解嘲。在粉碎敌人此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作战中，使我晋察冀边区军民进一步积累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便是“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话来说，“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部队和机关都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

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们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圈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1942年在打退敌一系列“扫荡”进攻之后，进入1943年春夏之交我北岳区抗日军民又粉碎了敌人的一次大“扫荡”。敌人这次大“扫荡”，以分区辗转的方式，首先将矛头对准我北岳区第四军分区，尔后又重点指向我北岳区第三军分区，其总的企图还是为了寻歼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4月19日至28日，为敌第一期“扫荡”作战。敌华北方面军调集第一一〇师团和第八、第三、第四等3个独立混旅成团各一部共1.2万人的兵力，分路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同时出动，对我阜平以南之陈庄为中心的第四军分区进行合击。由于敌轻装急进，迅速控制我第四军分区周围要点并形成压缩包围圈，也由于我军正忙于紧张的反“蚕食”斗争等原因，使反“扫荡”作战曾一时陷入被动。但在我军很快明察敌情之后，便紧紧抓住“敌昼夜连续运动，过度疲劳，翼侧暴露，兵力分散和后方更加空虚等弱点”，采取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由被动局面转为主动进攻：在外线，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广泛袭击敌新设据点；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广泛游击、阻击和侧击进攻之敌。在我抗日

军民的奋力打击下，“扫荡”我第四军分区之敌遭到惨重杀伤而败退。4月29日至5月10日，为敌第二期“扫荡”作战。敌华北方面军纠集第二十六、第一一〇两个师团及第一、第三、第八等3个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兵力，先以“分进合击”的手段，由曲阳、满城、定县和倒马关地区出动，对我第三军分区的军城、北晴醒、固城等地构成包围圈，后又用“扫荡剔抉”的办法，奔袭各攻击目标，大肆进行杀、烧、抢掠。针对“扫荡”之敌的行动部署，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一面实行分散阻击，杀伤进攻之敌；一面开展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广泛袭击敌人。我抗日军民协力配合，英勇进击，取得了歼灭敌人1700余众的重大战绩。进入我根据地之敌，在无法立足的情势下，被迫即行撤退。

1943年秋冬，在敌抽调兵力增援其太平洋战场之前，对我北岳区发动了一次所谓“毁灭扫荡”。我北岳区抗日军民在晋察冀军区指挥下，又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规模“扫荡”。此次“扫荡”，敌华北方面军动用了第一一〇、第二十六、第六十二师团及第三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和伪军共4万余人的兵力，其打击的重点目标，是我北岳区之腹地第三、第四军分区。针对敌人的进攻，我北岳区抗日军民按照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反“扫荡”作战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并且运用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主力和民兵相结合、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武装斗争和其他斗争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拼杀与较量。9月中旬至10月上旬，系第一阶段反“扫荡”作战。从9月15日

至 18 日，敌以 20 个步兵大队，在炮兵和坦克兵掩护下，分八路出动，并占领若干据点，完成对我第三、第四军分区的“合围”。至 9 月下旬，各路敌军始进入我中心区，并依托其临时据点，又向我展开了“分区清剿”。为打破敌之“合围”，我晋察冀军区分兵两线：以 1/3 的主力团和地区队，连同边沿地带的县区武装及武工队，跳出外线，展开交通破击战，切断敌之补给线，破坏敌之后方设施；用 2/3 的主力团和地区队置于内线，并以营、连为单位，结合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迟滞、消耗、疲惫敌人。接着，我北岳区各军分区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首先充分利用“青纱帐”，大力组织射击组、爆破组，与民兵游击组密切配合，扼守各要道、隘口，展开麻雀战、地雷战，主动打击“清剿”之敌，终置“清剿”之敌一无所获，反遭到我军民的不间断杀伤。尔后，又一面将坚持内线作战之部队适时集中兵力，结合民众武装给“清剿”之敌以重创；另一面则将置于外线作战之部队向敌后交通线及据点发起猛烈攻势，密切而有力地配合了内线军民的反“清剿”斗争。敌在内受重挫、外遭打击的情况下，被迫抽调其“清剿”兵力回援后方守备。敌之“扫荡”部署顿行错乱，我第一阶段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从 10 月中旬起，转入第二阶段反“扫荡”作战，至 11 月上旬始告结束。在此阶段，敌鉴于其兵力不足，只得缩小“扫荡”范围，并且将“扫荡”的主要目标，改变为抢粮和合击我领导机关。针对敌人的进攻，我军一分为二，以一部兵力掩护唐河、沙河、滹沱河流域之产粮区群众抢收粮食，进行“坚壁清野”，使敌抢粮